

利玛窦与徐光启



神州文化集成丛书

孙尚扬 著
汤一介 审定

新华出版社



神州文化集成

利玛窦与 徐光启

孙尚扬 著
汤一介 审定

新华出版社

神州文化集成

京新登字 110 号

神州文化集成丛书

利玛窦与徐光启

孙尚扬 著 汤一介 审定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 销

中国印刷公司监制

北京志诚文字图像处理新技术有限公司制版

北京顺义李史山胶印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5 印张

插页 2 张 108,000 字

1993 年 12 月第一版

1993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ISBN 7-5011-2140-0/G·791

定价：8.00 元（软精）

2.90 元（平）

序

季羨林

最近几年来，有关方面的人士提出了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口号，立即得到了全体中国人民，甚至海外华人和华裔的同声赞扬和热诚响应，足证这个口号提到了人们的心坎上，是完全正确而且及时的。

根据过去的经验，所有正确的口号都必须落实到行动上，才算有效。因此，我们中国文化书院的同仁们和中国华诚集团文化传播公司总经理李生泉同志等，爱国不敢后人，也想尽上自己的绵薄，为这宏伟的盛举增砖添瓦，几经酝酿磋商，发起了这项《神州文化集成》大型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这中间也得到了新华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计划先出一百本，并将配以电视录像。读者与观者，不限于大陆上的同胞，也包括大陆以外的华人和华裔；台湾在内，自不在话下；我们甚至想象，连在历史上同中国文化交流密切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也都包括在里面。至于这个范围以外的世界上所有想了解中国文化的国家，如果对我们的丛书和影

视也感兴趣，我们当然也衷心欢迎。“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这就是我们的期望。

抱着这种想法和期望，我们开始了组稿活动。在较短的期间内，我们约请了一些国内学有专长的老中青年的学者，承担各书撰写的任务。尽管有不少学者工作十分繁忙，但是一听到我们发起的宗旨，无不慨然应允。为了保证著作质量，我们规定了严格的审稿制度。谁也没有“特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弘扬我们先民留下来的优秀文化。这一点，我们可以心安理得地告诉我们的读者和观众。

《神州文化集成》丛书最初我们想定名为《神州文化精华》或者《精粹》。但是有的同志认为，从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点上来看，我们中华文化，不管有多么光辉灿烂，不管对全人类做出了多么巨大的贡献，它同任何时代的任何国家的文化一样，并不可能完全都是精华。我们的丛书中也介绍了一些非介绍不行的反映中国特殊文化的现象，它也许谈不上什么精华，但也绝非“毒品”，它似乎是中性的，绝对无害，也许还有点益处，它能增强国外读者和观者对中国的全面了解。基于以上的考虑，我们把本丛书命名为《集成》。

我们的丛书虽然冠以“神州”，但是我们考虑问题的视野却绝不限于神州。

最近几年来，我经常考虑一些有关文化的问题。如果说我的考虑有什么特点的话，那就是，我并不囿

于神州这一个地区，也不限于当前这一个时代。我收藏着一方清代浙派大家陈曼生刻的图章，其文曰“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这完全符合我的精神。我于文化问题绝非内行里手，我也不装出这番模样。但是，我看到了一些东西，想到了一些东西，我不愿意妄自菲薄，也不愿意敝帚自珍，于是就写了一些短文，在不同的座谈会上也做了几次发言。得到的反应多是肯定的。连一些外国学者也不例外。这当然增强了我进一步探讨的信心。

我觉得，我们过去谈论中国文化，往往就事论事，只就中国论中国，只就眼前论中国。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像瞎子摸象一样，摸不到全貌，摸不到真相。经过我多年的思考，我认为，从人类整个历史来看，全世界人民共创造出来了四个大的文化体系。所谓“大”指的是历史悠久、影响广被、至今仍然存在的文化体系。拿这个标准来衡量，我发现了只有四个：中国、印度、伊斯兰和欧美。其中前三个属于东方文化范畴，第四个属于西方。东西两大体系，有相同之处，也有相异之处，相异者更为突出。据我个人的看法，关键在于思维方式：东方综合，西方分析。所谓“分析”，比较科学一点的说法是把事物的整体分解为许多部分，越分越细。这有其优点：比较深入地观察了事物的本质。但也有其缺点：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所谓“综合”就是把事物的各个部分联成一气，使之变为一个统一的整

体，强调事物的普遍联系，既见树木，又见森林：普遍联系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它完全符合唯物辩证法。

我浅见所及，东西文化的根本差异即在于此。

中国文化是东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想了解中国文化，必须了解东方文化；而要想了解东方文化，必须了解中国文化。东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了解必须同时并进，相互对照，相互比较，初时较粗，后来渐细，螺旋上升，终至豁然。

我想先从医药中举一例子。人们都知道，西医和中医是完全不同的，两者的历史背景完全不同，发展过程也完全不同，因此，诊断、处方、药材等等都不一样。最明显的差别是大家所熟知的：西医常常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中医则往往是头痛医脚，比如针灸的穴位就是如此。提高到思维方式来看，中医比西医更注重普遍联系，注意整体观念。

再拿语言文字来作一个例子。西方印欧语系的语言，特别是那一些最古老的如吠陀语和梵文等等，形态变化异常复杂，只看一个词儿，就能判定它的含义。汉语没有形态变化，只看单独一个词儿，你就不敢判定它的含义，必须把它放在一个词组中或句子中，它的含义才能判定。使用惯了这种语言的中国人，特别是汉族，在潜意识里就习惯于普遍联系，习惯于整体观念。

再如绘画，中西也是不相同的。许多学者，比如申

小龙先生等,认为西画是“焦点透视”,中国画是“散点透视”。你看一幅中国山水画,可以步步走,面面观,“景内走动”,没有一个固定的焦点。申小龙还引用了李约瑟和普利高津的意见,认为汉民族有有机整体思维方式。

从上面几个简单的例子中可以看出中国文化的特点。约而言之,这个特点可以归纳为普遍联系和整体观念。从“科学主义”的观点上来看,这未免有点模糊,但是这个“模糊”却绝非通常所谓的“不清不楚”,而是有比较严格的科学含义,它强调的正是普遍联系。这同我上面讲的东方文化的思维方式是“综合”,是完全一致的。

我的这一点想法,颇得到一些学人的赞同。在北京召开的“东方文化与现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我讲了我的看法。会议结束以后,一位日本大学教授专程来到我家,向我表示他很赞成我的意见。我最近到南朝鲜访问,在社会科学院的一次座谈会上,我又谈了我的看法,一位大概是主张“全盘西化”的教授说:“我们韩国没有东方文化!”我在大吃一惊之余,举了几个我在汉城几所大学中看到的例子,说明那里是有东方文化的。那位教授最后还是承认了我的看法。

但是,不管有多少人赞成我的想法,我毕竟不精于此道。亿而偶中,是可能的;亿而不中,又何尝不可能呢?我这一点粗略的想法,在可预见的时间内,无法

用实践来证明。即使在非常长的时间内，也只能逐渐地通过世界文化的发展来验证。这一点我想是大家都能够同意的。

一个人自己有了一点新的看法，而且又觉得它是可能站得住脚的，总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理解。得到赞成，当然高兴；得到否定，也可以起他山之石的作用。我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像一个传教士一样，一有机会，就宣传我的“上帝”。现在就是借写这篇序的机会，再絮叨一遍。

我这一篇所谓总序只代表我个人的观点，我绝无意强加于人。强加于人的作法是愚蠢的。百有争鸣，我只是一家。但有一点我是十分坚定的，看中国文化，必须把它放在东方文化这个大框架内，放在世界文化这个更大的框架内，才能看得清楚。如果在时间和空间方面不能放开眼光，囿于积习，墨守成规，则对我们祖国的优秀文化，无论如何也是认识不清楚的。弘扬中华文化，发扬爱国主义，是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的神圣的责任。我们这套丛书的每一位作者和电视录像的制作者，都会认真负责地从事自己的工作。我希望，我们的任务能够完成；我希望，我们的目的能够达到。是为序。

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六日

目录

序	季羨林
引言	1
一、天路历程	3
(一) 裂开的岩石	3
(二) 精神狩猎	6
(三) 嚼鸣求友	13
(四) 在禁律面前	18
(五) 沉默的“福音”	22
(六) 另一种福音	27
二、耶教如是说	35
(一) “拨云雾见青天”	35
(二) “今不如古”	40
(三) 天主即“上帝”	44
(四) “人魂不灭”	48
(五) “人性之善不可疑”	54
(六) “太极不能为万物本原”	61
(七) “万物不可为一体”	68
(八) 三教合一——“折断天下之心于三道”	72

(九) “吾尝笑且惜彼经国之士”	76
(十) “人有三父”	78
三、行者的足迹	83
(一) 矫孳英迈—少年	83
(二) 科举“烂路”上的爬行者	87
(三) 在中西文明的交汇点上	91
(四) 需要与合作	96
(五) “郁郁不能有所建白”的政治生涯	101
四、儒生如是说	107
(一) “启生平善疑”.....	107
(二) “人生最急事”.....	112
(三) “其教必可以补儒易佛”.....	118
(四) “释然后失笑”.....	123
(五) “会通以求超胜”	130
五、荒原疾行	135
(一) 魂萦梦牵的科学蓝图.....	135
(二) 强国梦的幻灭——练兵与救亡.....	139
(三) 永恒的回响——呼唤开放.....	143
跋	150
后记	李生泉 151

引　　言

万历二十三年(一五九五)后，先是在江西文化中心南昌，其后在南北两京、大江南北，继而在士子文人中，有一部名为《交友论》的小册子不胫而走。这本小册子开篇即曰：“吾友非他，即我之半，乃第二我也，故当视友如己焉。”全书立意殊新，行文典雅，印行后被文人墨客广泛征引，备受称赞。然而，这本小册子的作者既不是仕途得意的儒生，也不是舞文弄墨的名士。他根本就不是自称“道德文章天下第一”的中央帝国的臣民，而是自称“自最西航海入中华，仰大明天子之文德、古先王之遗教”的域外“畸人”——一位西方传教士。他的名字叫利玛窦。

多年后，当利玛窦回顾他在中国活动的历程，总结其工作“成果”，撰写《基督教进入中国史》(即中华书局版《利玛窦中国札记》)时，利氏以第三人称不无自豪地写道：“不久这本书(即《交友论》)竟变成关于交友的权威书籍。这是利神父第一次用中文出版的书，此书使他结交了不少朋友，他也因此而出

名”^①。确实,这本小册子不仅使利玛窦赢得了附庸风雅的地位极高的皇室的友情,而且也使他逐渐见重于名公巨卿、士子僧徒。利氏的文名使很多士大夫引以为友并与他友好相处。

伟大的科学家、思想家徐光启是利氏的中国友人中最亲密、最杰出的一位,在吸收西方文化成果方面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客观地说,徐光启的贡献有赖于他与利玛窦等传教士的密切交往。中西科学、哲学、宗教之间的实质性交流始于此;而赖以沟通的第一座桥梁,正是利玛窦和徐光启等明末士大夫搭架起来的。利徐二人也确实如《交友论》所说的那样,彼此各以对方为“第二我”,彼此“视友如己”。虽然他们目标有所不同,但彼此之间的需求关系,使他们的合作达到了一种具有文化交流示范意义的水准,他们谱写了中西文明交流史上不可逾越的一章。思想家梁启超曾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从西方历算输入中国、徐光启等人开启的学风对清代学术的影响等方面,论证明末传教士来华是中西学术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段公案。著名汉学家、中国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也持类似的看法。

以拓殖浪潮为背景,以传教为目的的利玛窦,第一次实质地把中国文化介绍给西方;而存富国强兵并与西方争雄的徐光启,则是通过虚心向利玛窦同学而将西方科学、宗教、哲学引进传统文化急需补足的中国。这种工作的开创性及其深远影响,使得利徐二人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他们的功过确实值得史家们书于史、铭于心,更应引起今人之反思。

^① 《利玛窦全集》册一,二五五页,台湾光启、辅仁联合发行,一九八六年初版。

一、 天路历程

(一) 裂开的岩石

虽然明代曾有过郑和七下西洋的航海壮举,但对狂热的基督徒们来说,没有“享受”基督福音的明帝国,仍是一块冥顽不化、拒不开放的顽石。嘉靖三十一年,负有宗教钦使特权的传教士沙勿略(B. Franciscus Xaverius),登上了广东海外的上川岛,试图由此进入中国内陆,从而以基督教归化中国,并进而归化整个东亚儒家文化圈,但明帝国的海禁使他只能望洋兴叹。在紧张的谋划和焦灼的等待中,身心交瘁的沙勿略猝死于同年年底。弥留之际,这位绝望的传教士曾对着中国大陆喊道:“岩石岩石,你何时才能裂开?!”

在沙勿略发出最后呼唤的前两月,意大利中部偏东的小城马切拉塔的望族利启(Ricci)家中,迎来了一名新生婴儿,取名马特奥(Matteo)。命运之神将这名婴儿的生与沙勿略的死巧合地联系在一起,并在微笑中赐与他以沙勿略未能得到的幸运——钻入“裂开的岩石”,并从事一番艰苦的劳作。

沙勿略死前曾向欧洲人发回一系列报道,他告诫人们,

要想以基督福音归化日本、交趾，必须首先归化当时作为东亚文化中心的明帝国。日本人对儒家文化的不疑态度，使他坚定了这一信念。沙勿略的报道及其进入中国的梦想，极大地影响了欧洲天主教耶稣会。此后，耶稣会士们开始将其“精神狩猎”的目标，转向“文明鼎盛”而又神秘莫测的中国。

耶稣会是由西班牙人洛耀拉·依拉爵于十六世纪中期创立的，反对宗教改革的狂热激情是该会的特色。他们的口号是“以护教为中心、崇教为念”，组织“地不分遐迩，人不论文蛮”的“万里长征”，旨在为受到宗教改革运动冲击的天主教寻求新的信徒，并为欧洲的扩张服务。耶稣会的另一特色是注重选拔人材，重视对神职人员和传教士的教育。哲学家罗素认为耶稣会学校的教育是当时欧洲无可他求的最好教育。

利玛窦(Matteo Ricci)天资聪颖，在早年教育中练就了过目不忘的学习本领，九岁时进入耶稣会在马切拉塔创办的学校，成为颇受器重的优等生。十六岁，他父亲送他到罗马进大学攻读法律，望子成龙的父亲希望利玛窦能踏上仕宦之途，扬名显祖。但年轻的利玛窦却颇受罗马神秘的宗教生活气息之感染，传闻中的沙勿略的“圣徒”事迹更唤起他对传教士们探险生活的向往，无穷的激情使得这位年轻人背弃了乃父之初衷，他扔下枯燥无味的法律条文，叩响了罗马耶稣会总院的大门，并顺利进入耶稣会的罗马学院，开始了其耶稣会士的生活。在他看来，尘世富贵的诱惑，远不及“上帝”在天国对“圣徒”的召唤。在罗马学院，利玛窦一面接受严格的神学教育，同时还吸收古典科学知识，他曾师从当时著名的数学家克拉委奥(Cristoforo Clavio)，听受几何学。多年后，当他以这些科学知识吸引中国士大夫时，利玛窦常常感激地提到这位数学家，

并称之为丁先生。有证据表明,利玛窦在罗马学院时还曾涉猎过当时的人文主义思想、书籍,在《交友论》中,利氏就曾引征过著名人文主义者爱拉斯谟的格言。或许正是由于当时人文主义思想氛围的感染,利玛窦在日后的工作中能采取实际并带有宽容特色的态度,较为冷静地对待被视作“异教”的中国文化。

终日被宗教和探险激情萦绕的利玛窦,终于得到机会将其梦想变成现实。一五七七年,受“保教者”葡萄牙国王之请,罗马耶稣会总长决定选拔一批传教士送往远东。二十五岁的利玛窦随同罗明坚(P. Michael Ruggieri)等人于次年从里斯本出发,航波梯浪,开始了其向往已久的“万里长征”。这些“波涛间的使者”,历尽艰辛,绕道非洲南端,经过半年的航行,到达印度果阿——葡萄牙在远东的殖民地基地。资历甚浅的利玛窦,仍然奉命在果阿修道院进修神学。四年之后,也就是一五八二年,他奉远东教务视察专员之命,抵达澳门。其使命是学习中文,抓住一切机会,完成沙勿略未竟的事业。但饱受倭寇骚扰之苦并且担心殖民者入侵为患的明帝国依然实施严厉的海禁政策。传教士们要想钻入这块未曾裂开的巨大“岩石”,决非易事。

“岩石”是被凿开的,它毕竟不是无孔不入的。先期到达澳门的罗明坚使尽浑身解数,以西洋奇货贿赂广东地方官员,从而得到进入内地的机会。万历十一年,罗明坚引利玛窦入广东,得以在肇庆定居。

“岩石”裂开了。展现在利玛窦等人面前的是花园一般美丽而宁静的文明帝国。传教士们为岩石的裂开而欣喜若狂,更为归化中国的前景而充满热情和信心。但对传教士们来说,在

将中国引向上帝怀抱的路上，并未撒满红罂粟，而是充满荆棘，有时甚至是无路可走。对古老的中央帝国来说，几个隆鼻洋人入华虽不过是开了扇小小的窗户，但自此以后，上帝的使者与孔圣的贤孙之间将不得不展开对话。中西宗教、科学、哲学之间的实质性交流和冲突自此拉开了序幕。

（二）“精神狩猎”

那些经过古老的丝绸之路或航波梯浪由海路来到中国的异域商人，无一不以牟取暴利为其基本目的，而利玛窦等传教士来华的根本目的则是从事以基督教赚取中国的“精神狩猎”。虽然偶尔会有外来的干预，或有时因策略上的原因而不得不有所偏离，但利玛窦在中国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未尝须臾忘记这一根本目的。或者说，他在中国的一切活动都是以归化中国为中心的。西方人对他的其他希望，往往只是他活动背后的幕景——或隐或现。

利玛窦初来中国时，曾以花园来形容明帝国的美丽宁静，但这并不意味着明帝国象积贫积弱的近代中国一样，可以让猎手们耀武扬威，任意驰骋田猎。恰好相反，当时的明帝国虽然如吕坤所言一样，“国势如溃瓜，手一动而流液满地矣”^①，但它还有足够的力量维持半个多世纪的专制统治。单是利玛窦所见到的南京市民欢度元宵节时大放烟火，“在一个月中用去的硝磺，要比在欧洲连续作战三年用的还要多”^②，还有北

^① 吕知畏编刻《去伪斋集》卷五《答孙月峰》，吕坤撰此信时，利玛窦在南昌。

^② 裴化行《利玛窦司铎和当代中国社会》，第一册第一二九页。